

# 导 言

## 问题的提出

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及随之而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国政治历史文献中，是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词。伴随着农奴制改革而出现的自治机构，一开始便控制在贵族自由派手中，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的机构，与沙皇专制政府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惟一合法的又与政府立场有差距的政治组织，地方自治机构和沙皇政府一起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然而在十月革命中，由于地方自治机构站在自由主义者立场上，与苏维埃政权对抗，最终被布尔什维克所消灭。此后直到苏联解体前，地方自治机构被打入冷宫，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都很少提到它。在苏联时期，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胜利者们编纂历史时，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政治派别作为惟一的英雄人物。一部俄国史被写成是从革命民主派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政府的斗争史，这部历史中的主角是进步的革命者，反动的对立面是沙皇政府。其他的人物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其他的事件不管曾经多么具有影

响力，现在都变得微不足道。地方自治机构只是被当作政府的附带物偶尔一提。这种胜利者编纂自己光辉谱系的需要，使他们不能重视完整真实的历史：在 1905 年前革命之前，要求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力量是地方自治机构。革命者不可能为自己的手下败将和敌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除去歌颂胜利者的需要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苏联的社会科学界不仅缺少对地方自治的正面评价，甚至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这个原因就是地方自治所依据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可能构成强有力的威胁。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因为地方自治机构的贵族派立场（尽管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而与之对立的话，那么十月革命之后，则是因为地方自治机构的自由主义立场而与之对立。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反对一切专制与独裁，这一点使它成为沙皇独裁的敌人，也成为了劳农专政的敌人。如果过多地提及自由主义的理论，即便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及，也可能会导致其影响的扩散，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冷落，将其置于无人可知的角落。这一目的实现了。那个时代的苏联历史中仅存的关于地方自治的片言只语的描述已经将这一事件切割成不知来由又无法考究的知识碎片。

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俄国历史学的根本转折，新的胜利者们像上一轮的胜利者一样，在全面否定自己对手的前提下，追寻自己的“光荣传统”。瓦解苏联体制的政治理念正是自由主义，这一代自由主义者们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寻找自己的历史源流，他们找到了地方自治改革及其机构，以此为起点编纂自由派的知识谱系和英雄谱系。

当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他揭示了历史学选

择研究问题的最主要动力：人们的现实需要。当他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他阐明了历史学可能与科学精神相背离的功用：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两个命题所反映的真实与无奈都是那么清晰，以致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能作为学问，而不是作为科学存在。

然而，克罗齐的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他将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混为一谈，误将后人所编纂的历史记录当作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

的确，后人对于过去所发生的历史本体的认识，始终处于流变过程中，因时因人而异。而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本体却是永恒的、实在的，无法重现的，因而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学的使命就是尽量透过流变状态的历史认识去把握实在的历史本体，以求对永恒的接近与理解。

对于地方自治的研究与看法都只算是历史认识，就这些认识的起伏流变而言，人们看到的只是胜利者们一次次片面地编纂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一次次将历史变成残缺不全的文字杂烩。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些纷繁的表象，深入历史本体后就会发现，历史本体的完整性无懈可击，每一次的胜利都有其实在的根据，都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在这时，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胜利者们如何编纂历史教科书，而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实际过程。地方自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实践，历经启动、发展、失败、隐没、再现的过程，这不是主观杜撰的逻辑公式，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一种有着充分合理性的政治理念，总会获得实现的机会。历史编纂不过是表现这个真实过程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当我们把相当长时段的历史认识集中在一起来看

时，就能看到历史本体的清晰影像。这时，历史就是历史，是由无法更改的过去、由过去延续而来的现在和现在发展出的未来而构成的完整的河流，既不是什么当代史，也不是思想史。现实功利与意识形态需要各自以它们的片面和歪曲完成历史本体的完整形态。这一代胜利者提供的知识谱系是对上一代胜利者所造成残缺的校正和弥补，上一代胜利者提供的知识谱系同样是对这一代胜利者的片面的补正。遗憾的是每一代人只能以自己即时性的状态而存在，只能以自己的片面和短暂去实现历史本体的完整性。而历史学家的幸运与使命正是将一个个片面的历史片断缀成全面的整体。

## 关于研究方法

我们这一代学人经历了 80 年代的“理论爆炸”时代，那时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名词摩肩接踵、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就历史学方法论而言，我们也紧跟着潮流，模仿着操练那些陌生的词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思辩学派、文化形态理论、年鉴学派……我们也经历了 90 年代的“思想淡化、学术凸显”，很少提什么方法与模式，细致地梳理堆垒材料，以注释的多少、外文资料的比例来衡量研究的价值。这 20 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亢奋与冷静都融入我们的心灵与记忆，使我们对历史学研究方法有了较为稳定和独立的看法。

我在这项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地称之为经验主

义<sup>①</sup>的方法。也就是先尽可能全面详尽地收集各方面的史料，力图完整真实地再现地方自治改革活动的全貌。真实地说明地方自治机构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做；与之相关的同时期的其他政治力量又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做。在进行这部分的史料收集和整理重述的工作时，排拒任何价值立场，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只论事实之有无，不论问题之对错。我认为，只有将各种资料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并复述出来，才能接近历史本体的真实状态。由于地方自治是一项持续相当长时期的政治活动，牵涉到各种政治派别和国家的政体体制，因而，在横向分析某些具体问题时，我采用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方法，运行了阶级分析与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不认为这些理论框架的采用是对经验主义原则的背离。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分析框架只是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与解释，而不是先验的概念体系。也许会有读者将阶级分析方法视为陈旧过时的方法，是意识形态的余孽，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方法做些具体的说明。

经验主义：哲学上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是种认识论的理论或学说。它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惟一来源，片面地强调经验或感性认识的作用和确定性，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贬低乃至否定理性认识的作用和确定性。这里的经验，特指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经验主义一直作为与唯理主义对立的流派而存在，在哲学史上有各种经验主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具体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这里借鉴的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人的知识或观念只来源于经验。这一原则要求我们绝对尊重一切史实，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只能从史实本身中得出，而不是先提出某种先验的框架或模式来裁剪史实。我们不否认经验只是感性认识，但是能够真实客观地表述出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感性认识材料已属不易。至于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也必须于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人类社会因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分化为各种群体，这是不争之事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将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称之为阶级，并以阶级间的矛盾关系来解释社会政治变动。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路，发展成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学说。我认为，以不同阶级的利益取向和势力消长来解释近两个世纪的俄国政治历史变动是比较妥当的。正是俄国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构成了其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动力。从大量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了农奴因为要摆脱被压迫地位而表现出的斗争愿望，因为仇视上层富人和达官显贵而对改革的冷漠；我们看到了上层社会为保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优势而维持旧的体制，即便要改变旧的体制也要维护旧的利益结构所做的固执的努力；我们还看到了改良时代贵族自由派对社会下层的同情言论，也看到了在革命中他们与下层的对立。这一切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但是，我仅仅将阶级利益与斗争限制在理解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的行为动机方面，阶级利益仅仅构成不同阶级行为的动机，不是事件最后结果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不认为阶级斗争注定会导致什么结局，因为任何结局的出现除去利益上的原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发生作用，例如一个社会的外部环境，如俄国的战争状况。如果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取得了胜利，那么是否会爆发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俄国的下层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则当另作它论。再比如领导人个人的政治才能也对历史的最后结局产生着重大影响，如果李沃夫有列宁的策略和手段，那么能否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也是个未知数。当然，我们更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一切阶级消亡的大结局的出现，相反，历史与现实无时不提醒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阶

级作为一种经验性的存在可能将长期存在下去，阶级分析方法恐怕很难会过时。当剔除了阶级分析方法中先验的理论设定，仅仅是以其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政治与历史问题的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时，它就是经验主义的，而非唯理主义的，是一种可靠的社会科学认识论。

为避免读者对制度分析方法做概念化的抽象理解，从而简单地将某种具体制度形式作为政治进步或落后的标志，在此有必要对制度分析方法也做些具体的说明。

人类的政治活动总要进行制度创造，但任何制度的实质不能从其纸面上的形式设置来判定，只能从其产生原因和实际功能来判定。我把这种制度分析方法称之为经验主义的制度分析。俄国的地方自治机构和临时政府始终没有制定出一部真正的宪法，但我们认为它们是宪制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他们主张用法律来界定国家政权的权力边界与公民的个人权利范围，主张公民通过选举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按照他们的原则，公民可能一无所有，但拥有个人自由和法律上赋予的政治权利，拥有选票。这正是宪政<sup>①</sup>核心的实

宪政与专政：本文中所用的宪政概念是指依宪法而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形式。在西方政治学中，宪政和宪法甚至是一个词 *constitution*。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他的建国步骤时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的“宪政”，也是这种含义。宪政本质上是种“程序政治”，各种政治要素在理性的国家根本法的框架内合乎程序地运行。

本书中，专政采用了列宁的概念。列宁明确指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也就是说，专政是一种不承认任何法律依据的政治形式，是“非程序”的政治，因而，与宪政是相对立的概念。

专政这个概念在列宁以后又有多种衍变，现在通常被理解为国家机器的镇压与强制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讲，宪政国家也有专政的职能。但本书中是严格地将这个词的含义限制在列宁界定的范围内使用的。（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列宁全集》第一版第 10 卷）

质。苏维埃政权后来制定了成文宪法，但并没有人认为实现了宪政，因为国家的政治生活根本没有按照宪法进行。法律形同虚设，实际起作用的完全是另一套规则和机制。

所以，我在进行地方自治的制度研究时，注重分析的是其制度形成的原因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分析其每项制度的实际功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在二月革命前，尽管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家们抱有宪政的理想，但地方自治制度建设不能说是宪政的一部分，而是相反，地方自治的机构只是专制政府的附属物，相当于其中的一个地方职能部门。真正具有宪政意义的制度是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他们在努力按照宪政的规则运作，像已经成熟的宪法国家那样推行选举制度，更换政府领导人，热衷于颁布各种合乎程序的法令。

宪政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治理形式，显然具有诸多长处。但在俄国的屡起屡踏，直至现在仍很脆弱的事实表明，任何制度的实现依赖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应彻底放弃概念化的对制度的幻想，并非有了某种形式完整的制度就会实际发生作用。如果使这种制度发生作用的因素不存在，那么即使出现了形式完善的制度也是毫无意义的摆设，实际发生作用的因素会另行创造出实际发生作用的制度。影响制度发生作用的因素有许多，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一项，还有民族对政治形式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等。

经验主义的方法并不排除对历史的发展与政治行为的对错做出评价，但这些评价的标准必须是来自人类的真实经验，而不是未经验证的理论假设或尚未实现的美好理想。我在本书的结尾提出我所认同的历史发展标准即现代化的三原则：①现代的满足人

类需要的物质手段，即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物质手段带来的幸福应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即实现社会阶级结构的中层化。能使每个人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三项原则缺一不可，只有同时符合这三项原则要求的历史事件，才能被视为是进步的。就地方自治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尽管他们符合第一、三两项原则的要求，但在社会阶级中层化方面持相当保守的态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们在推进现代科学技术和宪政制度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也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陪葬品。而布尔什维克后来的活动则符合第一、二两项原则的要求，但在宪政方面的不足最终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试图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激进努力最终也违背了社会阶级结构中层化的要求。俄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致使其历史发展只能在这种摆动中曲折前进。这种评价的目的不在于歌颂什么或反对什么，而在于从尽可能全面的历史角度，提供对未来发展的借鉴。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仅仅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保证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我在研究过程中尽力严格地遵循了经验主义原则。它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将唯理主义未经验证的理论原则作为研究出发点，避免将历史学作为任何先验概念的婢女。

经验主义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一名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可以不预设立场，可以祛除价值判断。而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每个人都有受现实利益制约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超越经验现实的创造理想的能力和热望。我想，在恪尽学者的职守，进行纯客观的分析研究之外，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也完全可能、完全应该做出符合自己立场的功利选择和理想追求的价值判断。不过，这已是本书以外的内容了。

## 研究的结果和意义

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三年，在我的导师徐天新教授指导下，在其他师长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其主体内容作为博士论文，通过了博士答辩。

概括地说来，目前我在这个研究领域所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上梳理清楚了俄国地方自治机构和活动的全部过程，并系统地表述出来。提供了关于俄国地方自治改革与地方自治机构活动的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填补了关于这个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第二，在对 19 世纪中期以来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比较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解释了地方自治改革从兴起到消亡的各种原因。这些因素包括：俄国各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各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与策略手段，俄国国内的文化传统，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外部文明等。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在其他各章中也有零散的存在。

第三，在对当时其他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的地方自治理论和制度的了解基础上，对俄国地方自治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发现了俄国地方自治不同于其他国家地方自治的特点。按照严格的地方自治概念来讲，地方自治应反映出国家结构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但俄国的地方自治不是这样，俄国的地方自治不能称作是地方自治，只能称作是地方治理，ЗЕМСТВО 这个词译作“地方自治”并不恰当，而译作“地方治

理”更为妥当些。因为当时的沙皇政权还没有发育出成熟完整的国家管理体系和制度，俄国地方政府就是警察局，只能执行收税和警政等最主要的管理职能，还没有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职能。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是沙皇政府推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最主要动因。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也始终将地方自治机构视作是它的一个职能部分，给地方自治机构的职权范围也只是行政管理上、部门间职能的划分。在实践中，地方自治机构也的确行使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自地方自治机构出现后，沙皇政权才有了比较完整意义的县、省级政府。所谓 *Земство* 只是中央政权强化对地方控制的一个步骤和手段，是俄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与英法诸国的地方自治大相径庭。在这些国家中，地方自治是地方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成果仅是阶段性的，反映了作者现阶段史料掌握水平与认识水平，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会有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一项研究廓清某些问题，整理出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对全面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本，应该说部分地实现了研究的价值。但我自一开始就没有将地方自治问题只局限在其本身的范围内去研究，我感觉就事论事很难最终把事说清楚。所以，始终将地方自治置于整个俄国历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这样就将地方自治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与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引发更为深入广泛的思考。对我来讲，对地方自治活动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将一段隐没不彰的历史重新披白于后世，更在于通过这个观察角度去理解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如革命与改良、宪政与专制、地方与中央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而且与现

实俄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中国的现实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作用与评价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在革命者掌权的时候，革命崇拜理论主宰一切，改良派被当作反动政府的帮凶列入敌对面。在改良者当政的时候，则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将渐进的改良视作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革命崇拜论和改良最佳论各自从变革的成本与后果立论，各执一词，又都能言之有理。我以为，从经验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与改良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就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而言，已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不因后人的肯定或否定而消失。当然，人们争论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的目的并非是纠葛于过去不放，而是通过从历史过程中寻找资源，为现实选择提供支持论据。地方自治改革作为改良的一部分，曾经兴盛过，消亡过，如今又被俄国重新提起了。苏联解体后，在俄联邦的宪法中专门设了地方自治一章。似乎从这个角度来看，改良的生命力大于革命。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命运不能成为改良优于革命的证据。改良或革命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都走得通，并占据主导地位。革命与改良之所以能走得通，并不在于它们的成本大小与后果好坏，也不在于有没有历史根据，而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派别的实力与策略。因为从经验事实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时代都同时存在着改良和革命的因素，哪种因素占上风要看具体的形势，改良有过成功，革命也有过成功，就未来的发展而言，改良成功的可能与革命再现的可能性均不能排除。

有种倾向是将改良与革命联系起来，认为改良的结果是宪政，革命的结果则是专政。宪政作为法治基础上的国家管理方

式，自然更为人道、文明，更为进步。但为什么在俄国，改良和革命都没有实现宪政呢？地方自治机构为宪政呼号了半个多世纪，结果充其量只是专制政府的附属物，在他们掌握政权的短暂时期中，除了去推进并没有民众参与的选举外，就是回归旧的专制手段。李沃夫辞去临时政府总理时就是因为看到必须镇压人民（而这是违背自由主义和宪政理论的）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自己又不愿意这么做。革命当然也没有导致宪政的出现，革命过程中需要有铁的纪律和对任何敌人的无情镇压；革命后建立起的政权，虽然有宪法，但和没有一样。从时间段上看，改良和革命几乎同时选择了专政而不是宪政。由此可以认为，俄国当时的社会条件、文化条件及政治斗争环境均没有给宪政的实现创造充分的机会。宪政还是专政并非由改良或革命所决定，而是和改良一样，由其他诸多因素决定。

这些因素是什么呢？恐怕一时还很难列举齐全，可以明确看到的包括有：俄国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经济状况，社会阶级结构状况，国际环境等等。要想完全解释清楚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导致改良或革命的发生，又如何决定革命或改良的结果是宪政还是专政，尚需大量细致的研究，本书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日后去完成。

历史学既是门科学也是门学问，就其科学属性而言，它提供的经验可以说明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甚至在精密细致的研究后，可以对事物的未来走向作出较准确的预测。就其学问属性而言，它所提供的资源可以为任何一种立场的人提供服务。因为利益立场的限制和其他不可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在现实中正在创造历史的各种人都不会认真倾听并相信历史学家们客观的研究，

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资源，包括知识上的和心理上的。这时已经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观点是否经得起科学的推敲，而是坚信，只要如此就能实现目的，而只要实现目的，就可以说是科学的。这种属性我们不能扼杀，因为人类的意志天生自由，又总有创造信仰的能力。当某种学说或观点为某种信仰服务的时候，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科学论证，而是顽强坚持。任何科学都没有驱逐干净信仰的领地，历史学也一样。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严格恪守自己的职责，客观全面地描述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客观地提出各种解释。但在研究之外，作为现实中的历史创造者，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和信仰做事。这时，行为与科学无关，即便因为特别的知识背景可能使我们的表述方式貌似历史学研究，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学的术语来表达现实要求。

我坚持以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但也清楚地看到经验主义的结论对实际历史过程的局限性。毕竟我们本身也是人，是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谁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完整的历史本身说话。在这个角度上，本书的研究仍是一种“片面”的结论，有待于另一些“片面”的结论出现，以在更高程度上回复历史本来的完整与真实。

# 第一章 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衰落的巨痛：克里木战争

1856年3月18日（俄历，以下同）<sup>①</sup>，对俄国人来说是一个耻辱的日子。这一天，结束克里木战争的条约在巴黎签字。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付出了30万人死亡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失败。《巴黎和约》规定：俄国撤出多瑙河三角洲，俄海军不得在黑海航行，俄国放弃对土耳其东正教居民的保护。战争的决策者尼古拉一世沙皇在战局刚一明朗的1855年2月亡故。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接手的俄国已非1812年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的俄国，也不是1848年充当欧洲宪兵的俄国。新沙皇的兄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坦率直言：“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他们贫乏”<sup>②</sup>。

的确，克里木战争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的失败。它是对 19

俄历与公历在 19 世纪相差 12 天，20 世纪相差 13 天。

<sup>②</sup> 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第 76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世纪前 50 年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个结论。这个事实准确无误地表明，相对于英法等世界一流强国而言，俄国落后了。从经济发展情况看，19 世纪初期，英国的钢产量增长了 30 倍，而俄国的钢产量只翻了一番；俄国已经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西方进口制成品的国家。尽管从 1830 年到 1850 年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略有增加，但是其人口的增长更是迅速，1816 年时俄国人口约有 5100 万，到 1860 年已经达到 7100 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表 1-1 可以看出，1830 年俄国人均国民产值是英国的 49%、法国的 64%，到 1860 年时，只是英国的 32%、法国的 48%。

表 1-1 欧洲列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30~1860）

（以 1960 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

年代 国家	1830	1840	1850	1860
英 国	346	394	458	558
意大利	265	270	277	301
法 国	264	302	333	365
德意志	245	267	308	354
俄 国	170	170	175	178

资料来源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209 页，求实出版社，1988。

经济落后导致俄军装备水平的落后。俄国海军的战舰主要是木结构的，抗风浪能力差，火力也不足。英法联军的海军则装备有新式的蒸汽战舰，拥有速度和火力上的优势。俄陆军使用的是老式滑膛前装步枪，射程只有 200 码，而英法联军则装备有后膛装弹的有来福线的步枪，射程是老式步枪的 5~10 倍，且装弹速度也大为提高。交通运输的落后使俄军的机动能力也远远落后于英法联军。当时俄国的南部还没有铁路，运送辎重和兵员主要靠

马车。从莫斯科出发的增援部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而英法联军通过海路仅三个星期就可以把援军从法国和英格兰送到克里木前线。如此落后的俄国同当时世界一流强国英法对抗，如果不失败倒是意外了。

失败的巨创刺痛着俄罗斯民族的心，这是俄国历史上少有的惨重挫折。对一个奉行黩武主义，扩张成性的国家来讲，战争的失败就是最严重的打击。“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sup>①</sup>。一时间，自新求变已不只是一小部分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的要求，而成为整个俄国的呼声。尽管不同人对改革的内容与目的有不同的理解，但要求变革的共同性汇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将俄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大改革的年代。

## 第二节 “大改革”：民族传统与世界潮流的交响

以“大改革”来作为俄国 19 世纪 60~70 年代历史的代名词可谓恰如其分。在这期间以亚历山大二世为首的沙皇政府，先后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地方自治改革、司法改革及军事改革。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促使俄罗斯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同时，一些新的历史发展因素的出现又使这场变革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这些新因素一方面是俄国社会本身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4 页。